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原初语境与当代发展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张明

内容提要: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 既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之间的关联性, 也需要充分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效应与当代启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基础上展开的理论思索, 其中蕴含的丰富政治经济学思想构成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语境。重新梳理这一理论探索, 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本质原则”、立足中国实践经验的“本土原则”以及推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互动原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语境, 另一方面又结合新的实际作出了突破性发展。

关键词: 毛泽东 政治经济学 原初语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8)02-0012-08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 必须立足我国国情与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界在讨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时, 或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 或倾向于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展开相关阐述与论证, 鲜有研究集中关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性实践^①。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 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逻辑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 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 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4) 面对在经济文化水平较为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难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学习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苏联经验, 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毛泽东, 1999a) 展开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活动及其相关思想, 是对《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延伸与发展, 集中呈现了关于建构具有

作者简介: 张明, 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深化毛泽东研究的着力点及其政治意义”(项目编号: 2016M591830); 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问题意识、特色情结与理论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15MLC006)。

^① 目前国内学界较早关注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关系的学者代表是顾海良教授和张宇教授。顾海良教授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视为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幕; 张宇教授则从毛泽东如何对待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态度与实践创新出发, 提出了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启问题。

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思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条件下,回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历史语境,拨清在此问题上的思想迷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一个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认识领域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并自觉上升到自主性认知高度的辩证过程,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7)。无论是从理论的发展,还是从实践的发展来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本质上处于动态的历史性变化过程之中,在认识论上是一个开放性空间。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深刻根植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对它的认知与把握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认为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理论对于现实的反映、主体对于规律的认识,必须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过程。因此,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实践课题,必须充分把握动态发展的实践运动,以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螺旋上升方式展开的。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此问题上却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以及人们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9)毛泽东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对于规律的认识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必须置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甚至是经过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才能实现科学把握。“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毛泽东,1999b)毛泽东上述观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弘扬,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历史的经验总结。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由于主观经验不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人在此问题上也经历了一系列曲折。针对因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不足而导致的错误,毛泽东提出了严肃批评意见,并且将读书——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作为当前工作的重要内容(毛泽东,1999b)。在他看来,“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毛泽东,1999b),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要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深化。

第二,尽管当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从根本上仍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毛泽东从不断发展的实践中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思想,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经过改革开放40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了基本组织架构与运行方式。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已经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经济制度、摸清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所有规律,因此只需按照客观经济规律与改革之初确立的既定模式办即可。这种观点实际上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它一方面违背了哲学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即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性与阶段性;另一方面也不符合现实实践的具体发展情况。实践证明,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穷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需要以辩证发展的眼光不断进行探索性认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因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限制,许多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在认识上仍然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开放性特征,决定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历史过程性。尽管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不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但实事求是而言,当前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穷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部规律。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实践永无止境,作为实践

主观反映形式的理论,也必然会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所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外是相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才能构成绝对真理。因此,不可能存在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完全掌握的“绝对真理”。另一方面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推进解决。比如,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调控问题,不仅我们仍处于进一步探索之中,而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未能给予较为科学全面的解答。在此意义上,不能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陷入当前已经穷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论误区。必须要在不断变动的具体历史实践中、在主体能动性不断充分发挥的条件下,不断完善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不断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深刻变动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尤其坚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在深刻变化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突破,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例,它绝非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口号或理论符号,它不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经验总结,更是对人类近百年来现代化历史教训的总结,将关于发展的理念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提升到从规律层面出发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高度。新发展理念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性,是在直面当下中国发展问题、总结发展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产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实践的发展永无止境,因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必然处于开放性空间之中。

第四,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构成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关键原则。如何摸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命题。通过读书的形式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毛泽东时代因缺乏现成可供直接借鉴经验的无奈之选。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不能仅仅通过抽象学习理论或照搬他国经验就能完成,而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以实践为依托、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知与把握。因为规律并不能自动呈现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毛泽东,1999b)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而言,亦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首先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必须通过对上述现实实践与历史过程的科学分析,才能真正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并加以科学运用。正如有学者所言,“只有直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紧紧把握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会有其生命力。”(王立胜2016)因此,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之中,必须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脱离理论学习与理性思考的“事务主义”倾向。这种观点认为,只需沿着既有的模型框架向前推进、将手中的事情做好,就能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但问题是,规律并不具有自动呈现自身的机制,它需要主体在特定理论指导下、通过对现实实践经验的分析、总结才能加以认识。二是纯粹照搬照抄西方经验与理论的“拿来主义”倾向。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究其本质而言仍然是特殊规律,有待上升到一般规律,即上升到西方所谓的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必须依赖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充实与完善。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与客观历史进程来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从本质上而言是理论与现实交互关系的重大脱节。总而言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必须在矛盾特殊性原则的指导下,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特殊性”与“现实性”的深刻把握,从改革开放具体实践中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总结规律并应用规律(蔡继明、靳卫萍2016)。

二、计划手段: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特点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

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换言之,毛泽东阅读此书的根本目的既不是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感兴趣,也不是为了建构出一套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即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反观当下实践,以期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紧密结合国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若干有益思考。例如,关于科学认识计划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作用的理论思考,在当前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下经济体制改革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处理好政府(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的“对偶性”设定与毛泽东的辩证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域中,计划是作为市场的“对偶”而存在的,它构成了调节社会主义经济健康持续运行的基本方式,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可能并且必然会发生巨大的紊乱。”(马克思、恩格斯,1995)毛泽东高度认同计划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平衡是通过危机实现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通过计划来实现。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尽管计划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必须加以辩证而全面的分析。首先,计划是否具有科学性,需要将其与实际相结合并施加综合判断。毛泽东认为,计划属于意识形态,是实际的反映,并对实际发挥着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却存在积极或消极的两种可能性,即计划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也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看计划是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毛泽东,1999b)其次,如何科学认识、制定计划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并加以完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毛泽东,1999b)计划是建立在对规律的科学把握基础之上,而对规律的认识存在不断深化发展的辩证过程。最后,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平衡的重要手段,但仅仅是达到相对平衡而非绝对平衡。认为通过计划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平衡问题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懒汉主义思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毛泽东,1999b)矛盾的永恒性决定了平衡的相对性与非平衡状态的绝对性。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要保持比例和综合平衡,就是因为现实经济建设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不平衡状态。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保证有计划地组织经济,进而可以利用对平衡与非平衡规律的认识,不断促成相对平衡状态的生成,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非意味着计划(政府)与市场的绝对割裂或二元对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原先计划经济的僵化局面,充分凸显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市场对计划的取代,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结合说”从根本上符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考虑,正如他所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邓小平,1993)可见,强调使用市场手段并非是建立在对计划否定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是运用市场手段来弥补计划手段的不足,其最终目的不外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发展。在当代中国,计划并未如一些人所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消失,相反,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计划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近些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考验,国家宏观调控正是计划作用的集中彰显。可以说,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国家调控,还是微观层面的经济运行方式,都无法抹杀计划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

第三,强调计划(政府)作用与重返计划经济的保守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重视计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并非是走向以计划取代市场的另一个极端。当前,经济全球化已悄然成为席卷全球的“大趋势”,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股浪潮中。现代经济运行方式在全球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随着普遍交往状态的建立与强化,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更多地转向于对经济信息的及时掌控和迅速反应。较之于计划的结构相对稳定性,市场经济机制具有更为灵敏的“感应—反馈”机制,能够更有效地吸收经济信息、迅速调整经济决策。较之于市场的分散化,计划经济往往将权力过分集中,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就表现得相对缺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也曾注意到此问题,并着力加以调整,注重发挥两个积极性的作用。“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键的问题。”(毛泽东,1999b)中央对地方统得过死,正是计划经济的内在显著不足之处。所以,当前从另一维度鼓吹重返计划经济时代的观点,于理论或实践都不具备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构成了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

第四,正确处理计划(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必须坚持辩证法与两点论,“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2014)换言之,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同时,对其内在弊端也必须加以限制、补充和完善;对于计划的运用必须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所谓科学合理是指计划的决策者经过科学的调研并且掌握大量客观准确的数据,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基础之上制定计划。将计划简单等同于指令经济、命令经济或长官意志,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步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不断发挥计划优势与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严格地从具体实际出发,从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科学制定并稳步推进计划对调控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必须坚决反对“一股脑”的急躁情绪与脱离具体实际的“拍板上马”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不断提高经济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从根本上说,处理好计划(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指导,即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

三、辩证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

作为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将辩证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辩证法也成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深刻折射出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精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其关于辩证法在经济建设、经济研究过程中重要作用的思想,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要以辩证法为指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的作用,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资源而坚守。

第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性与非平衡性作为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切入点。如何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如何寻找研究的立足点与突破口,成为首当其冲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95)并且,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最为基础的细胞“商品”入手,通过分析其内在矛盾并最终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然而,拘于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如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做了进一步推进。“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1999b)“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平衡和不平衡”都是作为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而存在,从二者的交互作用出发来思考问题,不偏废一方,彰显了深刻的辩证法传统。此外,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便是,认为研究生产关系问题必须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研究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现实具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尽管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会发挥特定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因而,对生产关系的研究,须臾不能离开对上层建筑的深入关注。毛泽东认为,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生产力的大发展都是建立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毛泽东,1999b)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具有其内在合理性。然而,突破二者之间由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水平所形塑的内在张力关系,则必然会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误区,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曲折发展历史所留下的宝贵教训。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高度出发,以辩证的态度对待平衡性与非平衡性,高度承认“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审视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平衡性与非平衡性的有机统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

第二,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矛盾运动及其法则视为建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点。究竟如何研究生产方式的平衡性与非平衡性?毛泽东认为,必须要从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的客观矛盾出发,矛盾是构成平衡性与非平衡性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然而,苏联教科书却否认矛盾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在毛泽东看来,矛盾具有普遍性,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亦是如此。苏联教科书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就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毛泽东,1999b)因为缺乏辩证法的指导,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与研究原则存在明显不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生产过程中矛盾的理论思考与抽象阐释,而苏联教科书则脱离现实经济矛盾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从规律出发,进行单纯的概念演绎、推演。毛泽东明确批评了这种写作方式与研究范式,认为研究问题需要从客观存在的现象出发,进而通过分析寻求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以揭露事物客观存在的矛盾。因为不加分析地单纯从概念出发的定义研究法,其不是分析的前提,而是分析的最终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充分继承了上述思想,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做出了创造性发展。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复杂情况——“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直面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矛盾并主动加以适应、把握和引领,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便是直面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摒弃单纯解决总量性问题的传统方法,以满足需求为最终目的、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现存的结构性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

第三,注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建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指导地位。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历史性分析开始,研究中所使用的抽象概念其实是对具体现实的科学理论总结,因而蕴含着丰富的含义,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的“愈抽象愈具体”的理论表达。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很明显是缺乏现实实践经验的“书生”作品,未能较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是没有

辩证法的理论武装 缺乏哲学家头脑的著作。而没有哲学家头脑、不懂辩证法在他看来,是不可能成功地写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1999b)由此可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理论阐释,必须始终深刻根植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在辩证法的科学指引下,从现实存在的客观矛盾分析入手,用理论化形式对现实矛盾进行系统、抽象总结,以形成系列抽象概念并进一步加以分析与思考,构成了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正如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言,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写出《资本论》,是因为资本主义处于发展成熟的典型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还不够成熟,“现在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毛泽东,1999b)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视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一方面,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出发,坚持问题意识的导向作用,直面现实经济矛盾,既回避矛盾,也不因矛盾而故步自封。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例,摒弃从好或坏的形式主义思维理解新常态,明确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客观状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另一方面,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善于“弹钢琴”,辩证处理多元矛盾的复杂关系,辩证把握现实经济发展的趋向及其问题(习近平,2016)。

第四,以本土、本质与互动三原则作为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指引。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与研究,通过对现有感性经验与现实材料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总结,以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写出具有中国风格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单纯照搬西方经济学概念、范式的“拿来主义”做法,不仅不能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也必然会出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脱离的“水土不服”现象,最终也不利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因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基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总结,其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具体历史实践中存在着巨大的理论与实践双重“视差”。实践也已经证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不具备普遍性意义,因为其自身发展的困境已经从根本上证伪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所言的“普世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西方未能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其原因“就是没有对症下药,对复杂的结构问题仅仅使用解决总量问题的药方,原有矛盾没解决,又产生了不少新风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须坚持如下基本原则:一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灵魂。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首要理论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依赖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不是一个抽象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习近平,2016);二是坚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的“本土原则”,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历史实践中汲取感性经验与理论质料进行加工与整理,及时系统地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进行理论的总结与凝练;三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原则”,既不走向单纯停留于书斋的抽象理论建构,也不囿于纯粹依赖既往实践的经验主义,而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贯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概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不仅能够反驳贬低毛泽东缺乏经济思想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论调,而且有助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提供有益启发。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内在逻辑理路上的一脉相承性,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守了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探索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也结合新的历史与时代条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拓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与把握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 蔡继明、靳卫萍 2016: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 2。
- 邓小平 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顾海良 20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及理论结晶——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毛泽东研究》2016 5。
- 毛泽东 1999a:《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9b:《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立胜 20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 6。
- 习近平 20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 2016:《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 张宇 2016: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6 2。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3:《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9:《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The Original Context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Zhang M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 The goal of developing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not be achieved unless combining the two period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completely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reading of the Soviet text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Mao Zedong mad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based on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his rich thought on political economy constituted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thinking thes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will be methodologically relevant for developing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to say, it is essential to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be based on China's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Xi Jinping Thought on a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inherited the original context and achiev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based new practices.

Key words: Mao Zedong; Political Economy; Original Contex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责任编辑:王燕燕)